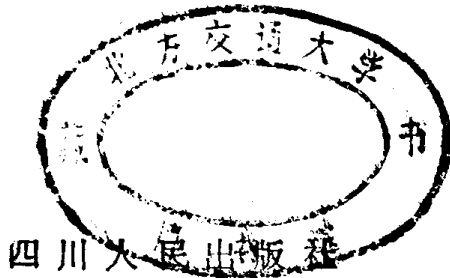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李世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者同志们的批评指正，以便继续改进。

李世平

1984年4月于四川大学

516231

93查

责任编辑：邓星盈

封面设计：邱云松



4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李世平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1 插页1 字数240千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750 册

书号：3118·296

定价：1.90元

前 言

应四川人民出版社之约，我把近几年讲授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课程所编写的讲稿，改写成为这样一部供一般读者阅读的专业知识性的读物。为求简要，只写了主要的问题。书中叙述的是从1919年到1949年这段历史时期的主要的政治思想。照我国一般大学历史专业的课程名称，这段历史一直称为中国现代史。目前历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究竟使用什么名称为好，有不同意见。本书仍然按一般大学的历史专业课程设置的习惯，使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这个名称。同时还考虑到，改写成现在这样一部书，虽然是以供一般读者阅读为主要目的，但也可以供大学历史专业的学生作为学习本课程的教科书或参考书，所以最好不用习惯以外的名称。

把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教学和研究，一般说是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才打开局面的。作为一门学科来看，是很年轻的。但这门学科的主要内容却并不是什么新的问题，其中不少问题是学术界早有研究的。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有关问题的研究或是有关史料的搜集编纂，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新成果对于我自己的教学和本书的写作，都有很大的帮助。本书吸收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成果，特向他们致以谢意。限于水平，属于我自己编写本书中间出现的缺点错误，一定是不少的。我诚恳地希望得到专家和读

目 录

第一章 “五四”前后新思潮的发展和分化（1915—1921）	（ 1 ）
第一节 李大钊	（ 3 ）
第二节 陈独秀	（ 15 ）
第三节 青年毛泽东	（ 29 ）
第四节 中国无政府主义	（ 41 ）
第五节 蔡元培	（ 54 ）
第六节 胡 适	（ 62 ）
第七节 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勱、梁漱溟	（ 73 ）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改良主义思潮和反共思潮的发展（1921—1927）	（ 93 ）
第一节 改良主义的几种政治主张	（ 94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 104 ）
第三节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 116 ）
第四节 反共的戴季陶主义	（ 131 ）
第五节 反共的国家主义	（ 142 ）
第三章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中国法西斯主义，各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1927—1934）	（ 151 ）
第一节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 152 ）
第二节 蒋介石集团的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	（ 166 ）

第三节	国民党改组派·····	(176)
第四节	第三党·····	(185)
第五节	人权派·····	(195)
第六节	乡村建设派·····	(204)
第七节	中国的托洛茨基反对派·····	(218)
第四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同 妥协、反共理论的对立和斗争 (1935— 1943) ·····	(232)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新 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提出·····	(234)
第二节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和《中国之命 运》·····	(251)
第三节	中间党派的抗日和民主的主张·····	(263)
第四节	封建、买办、法西斯的史学观点，反动的 “三民主义”观点·····	(274)
第五节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谬论和汉奸的卖国谬 论·····	(288)
第五章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和新民主主义国 家理论的胜利 (1944—1949) ·····	(296)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论的胜利 ·····	(297)
第二节	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方针和假民主骗局的彻 底破产·····	(308)
第三节	中间党派的建国主张和中间路线的破产···	(315)
第四节	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 的帝国主义谬论的破产·····	(332)
结束语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	(343)

第一章 “五四”前后新思潮的发展和分化（1915—1921）

对中国现代史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的创刊开始的。在此以前，从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纷纷向西方找寻救国真理的中国人，已经陆续从西方输入了各种流派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当时笼统称为“新学”。对闭塞已久的中国而言，这就是新文化。但是，在《新青年》创刊以后，输入和阐述西方文化的规模和范围都空前地扩大了，形成了新文化运动。这是1914年欧战开始后中国民族工业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机会所引起的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反映；是在袁世凯政府的封建专制本质和日本侵华野心进一步暴露的情况下，人们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失败而重新探索中国政治出路的迫切要求，也是对1913年开始出现的封建复古思潮的反击。因此，新文化运动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性。

在新文化运动中，除了运动后期开始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而外，在大量被介绍到国内的外国思想家及其学说中，发生过比较明显影响的，大致包括英国的达尔文，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斯宾塞，柯尔，罗素；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普鲁东，柏格森；德国的康德，黑格尔，尼采，费尔巴哈；俄国的托尔斯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美国的林

肯，亨利乔治，杜威；意大利的加富尔；挪威的易卜生；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等。在政治思想上，居主要地位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在社会历史观上，最流行的是进化论。实际上，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已经落后和日趋反动，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理论支柱。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几乎一切西方学说一旦被介绍到中国，都属于新思潮的范围。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不仅一时有新鲜的感觉，而且往往可以从中找到各自感兴趣的思想启发以至改变旧中国面貌的政治方案。

事实上，无论在中国或在世界上，真正当之无愧的新思潮只有马克思主义。据近年来国内史学界的研究，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引进各种西方思想的同时，大致从七十年代起，一些知识分子便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状况有着零星的、初步的了解。到二十世纪初，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人通过翻译和介绍主要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又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认识，并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①。由于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而登上政治舞台，还缺乏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基础；由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只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级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都使他们无法正确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原理，往往以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观点来曲解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一些激进分子中间，占主要地位的思潮是无政府主义。所

① 姜义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一期。

以，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以前为止，在中国都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真正传播的事实。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以后首先在中国认真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界最初也只是把它当作新思潮的一支，缺乏应有的重视。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新思想促成了崭新的政治运动，崭新的政治运动又为新思想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迅速传播开来，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出现了。这时，政治思想领域的形势便产生了新的结合和分化。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坚持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公开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出现了三次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新思潮发展了，也旗帜鲜明地分化了。

第一节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①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今卢龙县）中学，开始接触“新学”，喜欢读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有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从1907年起，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六年，开始倾向革命。辛亥革命以后，他对袁世凯篡权以后的中国时局深感忧虑，痛心疾首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共和国的名实相乖。他在1913年4月发表的《大哀篇》中

^①李大钊：《狱中自述》，见《李大钊传》第一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沉痛地写道：“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① 1913年冬，李大钊赴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同时在日本积极参加爱国反袁活动。1916年春，李大钊在日本写出著名的《青春》一文，发表在国内的《新青年》二卷一号（1916年9月）上。李大钊事实上已成为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同年5月，李大钊回国，先后担任北京《晨钟报》和《甲寅》日刊的编辑。1918年1月，他在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以后，开始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随后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参加创办《每周评论》。1920年7月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同时积极从事缔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随及成为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4月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不久遇害，为革命英勇献身。

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五四”爱国运动前后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最早代表是李大钊。在此以前，李大钊虽然基本上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但他的强烈的爱国感情，他的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他在日本对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的研究^②，他的早期著作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因素，使他在主张革命民主主义的同时，不是完全附和和各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而能采取一定程度上的批判态度，有所创新。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不久，他能够较早地向共产主义者转变，决不是偶然的。限于本书的结构和篇幅，不能对李大钊的全部思想进行述评，³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窥见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

^①《李大钊选集》第一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李大钊传》第十五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思想特色。

（一）“青春”的进化观 这是当李大钊还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的一个基本观点。严复在1898年翻译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最早在国内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同书中，严复又在他写的按语中提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观点。从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以及“人满为患”等等话题，便常出现在国内许多文章中和知识分子的口头上，成为相当流行的社会历史观点。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这类观点的开始出现和流行，固然具有激励国人猛省国家民族之垂危，当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积极效果。但是，从十九世纪末期发展起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用种族优劣来解释社会进化的观点，同一贯敌视劳动人民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观点结合起来，已经成为当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要理论支柱。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多数具有反对外来侵略的爱国情操，却往往不能从理论上识破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本质上的反动性；受其蒙蔽，又出现民族自卑感和美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极效果。

在李大钊的早期著作中虽然也具有进化论的明显影响，但他能够对进化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把进化论的精华概括成为新陈代谢的观点，认为新陈代谢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通规律。他在《青春》这篇名著中提出：“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之公例，莫或能逃者也。”^①这样，就扫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人类的

^①《李大钊选集》第七〇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种族优劣的谬论，宣传了进步必然战胜落后的新陈代谢的发展规律，即“青春”的进化观。在李大钊看来，新兴与陈腐的对立，朝气蓬勃与死灰沉滞的对立，青春与白首的对立，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陈腐可以化为新兴，死灰沉滞可以奋发朝气，白首可以孕育青春。因此，他向中国青年大声疾呼：“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的再生。”^①他的闪耀着辩证法因素的思想火花，有助于国人消除民族自卑感，奋发为青春中国战斗的革命精神。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人种妄分优劣，又把优劣的对立绝对化；对“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作形而上学的解释，就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吞并别的国家民族的理论根据。李大钊在《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着重批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谬论。他指出，帝国主义“谓地球之面积有限，人口之增庶无穷，吾人欲图生存，非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不可，盖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天演之义，万无可逃者也。此其所据，全根于马尔萨斯之人口论与达尔文之天演论（按：此处指社会达尔文主义）”^②。认为这是“文饰侵略”的借口。李大钊进一步揭露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有助长战争之恶影响者，半由其说本身之不完，半由野心家之利用。”^③两种学说的根本荒谬之处，都在于用生物规律冒充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诚不知以心灵理性超绝万类自夸之人类，视禽兽之互相吞噬者，相去何几耶？”^④李大钊认

①《李大钊选集》第七一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同上，第八三页。

③同上，第八四页。

④同上，第八五页。

为：“余维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所谓贪，是“以自享之物为未足，而欲强夺他人之所有”；所谓惰，是“不思竭自己之勤奋，求新增之创造，以为自养”^①。这实际上是指剥削阶级的贪婪和不劳而获。李大钊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不能说明战争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但是，他已经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荒谬借口，基本上批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动性质，因而有助于从正面树立青春的进化观。

（二）“民彝”创造历史 这是当李大钊还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又一基本观点。他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接触到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问题时，明确地提出：“是则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②民彝，大意指人民的政治要求。李大钊实际上提出了人民创造历史的重要观点。他还没有关于阶级斗争概念，但他相信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是无法压制的；如果受到压制，就会采取斗争的方式来表达。他用中国的历史来证明他的观点，指出一部二十四史中“不绝于书”的无数“斩木揭竿”的农民战争，并非“皆具好乱之天性”，也不是“皆怀帝制自为之野心”，在根本上，“固皆民彝见制，迫不得伸，乃于偶变逆激之道以求其达之征也”^③。这是明显地非常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

基于青春进化观和民彝创造历史的观点，李大钊认为，国家政治体制的发展，应该不断向更加能够体现人民意志的

①《李大钊选集》第八五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同上，第四六页。

③同上，第四五、四六页。

方向进化，而决不能相反。在中国当前，就应该采取比较容易表达人民意志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即是“惟民主义（按：即Democracy民主主义的一种译名）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词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络愈易疏通之政治也。”^①但是，代议制度也并非最理想的体现人民意志的制度，民国以来的国会的有名无实便是证明。所以，李大钊的政治主张实际上是要求突破代议制的局限性。他认为：“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与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他断定：“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较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确信而无疑焉。”^②

李大钊暂时还未能明确认识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必然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他确信应该寻求比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更能体现人民意志的制度；同时也确信：“国家之事，经纬万端，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举，圣智既非足依，英雄亦莫可恃，匹夫之责，我自尸之。”^③创造崭新的比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只能依靠人民自身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少数圣智、英雄或神武人物，这是李大钊关于民彝创造历史的观点的进一步发挥。他认为，只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对于“残民之贼，锄而去之，易如反掌，独此崇赖‘神武’人物之心理，长此不改，恐一桀虽放，一桀复来，一纣虽诛，一纣又起”^④。彻底破除对圣智、英雄之类“神武”人物的迷信心理，是民彝创造历史的观点的必

①《李大钊选集》第四〇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同上，第五〇页。

③同上。

④同上，第四七页。

要补充。

但是，李大钊不同于“打倒孔家店”运动中的某些形式主义的绝对化的主张，他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孔丘和其他圣智英雄的历史作用，而是历史主义地把他们放在当然的位置上。他认为：孔丘是“一代哲人”，不是“万世师表”；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嘉言懿行”可以“示人以创造之力”，而“不在其法制典章示人以守成之规”^①。他承认圣智英雄有比常人卓越之处，但并非神人。他说：“夫圣智之与凡民，其间知能相去不远。彼其超群轶类者，非由时会之因缘，即在众庶之信仰。秉彝之本，无甚悬殊也。”圣智英雄之所以卓越，在于他善于依靠众人的力量，善于集中众人的智慧。“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②这样，李大钊就相当精辟地指出了民主与专制的根本区别，不在政治体制的形式，而在英雄即政治领袖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彼其众庶，立于水平线以上，以驱策英雄俾为民用可也；降于水平线以下，以待英雄之提撕，听英雄之指挥不可也。彼其英雄，守一定之限度，以代众庶而行众意可也；越一定之限度，背众庶以独行其意不可也。此实专制国民服事英雄与立宪国民驱使英雄之辨，亦即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之所由殊也。”^③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到：“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④李大钊还是革

①《李大钊选集》第四六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同上，第四八页。

③同上，第五〇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六九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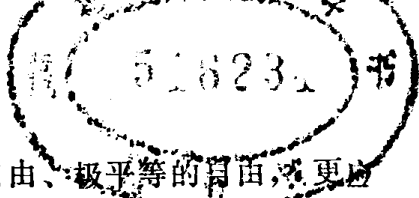
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还没有能够对众庶和英雄进行阶级分析。但是他认识到了专制的国体同立宪即民主的国体的根本区别不在于表面的形式和名称，而在于众庶和英雄的关系，在于他们的政治地位如何。这在当时，显然是可贵的政治见解。

（三）宣传马列，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李大钊热情地宣传十月革命，宣传指导俄国革命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开始了从进化论和民彝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转变。他首先看到的是“俄则由极端之专制主义，依猛烈之革命，一跃而为社会民主矣”^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向李大钊证明，他原先向往的“较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这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②。中国人民应该“翘首”迎接社会主义的曙光的到来。以后，在他所写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等文章中，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他指出：“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按：即Democracy民主主义的又一译名），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列宁氏虽称道平民政治，却反对议会政治。他以为议会制度纯是欺人的方法。……而特权政治则在内幕中施行。”“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政治”^③。无产阶级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就是社会主义制

①《李大钊选集》第一〇七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同上，第一〇四页。

③同上，第三九七页。



度。所以，“我们想得到真正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应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①

如何才能打倒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呢？李大钊在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中，详细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第一，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②第二，然而社会主义又不是可以坐待它自发地实现的。社会主义是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崭新的生产方式。任何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首先是“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所以，“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③李大钊强调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就是俄国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猛烈之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原理中，“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在革命实践中，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④。第三，李大钊把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建立，作为一个过

①《李大钊选集》第四七八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同上，第四六五页。

③同上，第一九〇、一九一页。

④同上，第一七七页。